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一二）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七五期 ——

（二〇〇四年四月六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404b）

---

【研究动态】专访“文革”反思片洋导演卡玛	心 远
【影视评论】《八九点钟的太阳》与真实“文革”	双 叶
【各抒己见】红卫兵受骗？卡玛错了！ ——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刘自立
【史实辨析】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	胡 平

---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mailto: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研究动态】

专访“文革”反思片洋导演卡玛

• 心 远 •

元月30日，《多维时报》记者采访了反思“文革”记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制片人兼导演之一卡玛。卡玛就其名字声明说：“你们发文章千万不要给我生造一个‘卡玛·韩丁’的名字。我从来没用过。在中国我就是卡玛，虽然‘百家姓上没有姓卡的’（1966年老农听我报出姓名后语），但我从小就是这么被人称呼的。对于永远是不伦不类的我，这个名字很好，用的时间远早于Carma Hinton。‘韩丁’是我父亲的中文名字，即姓‘韩’名‘丁’（取‘丁’字为的是笔画少，好写），并不是Hinton的音译。”

长的白人模样，却一口极其道地的“京片子”，让人乍一听真是难以置信。卡玛对人们这么惊讶已经司空见惯了，不过她的母语本来就是中文。她父亲韩丁四十年代后期被联合国救济总署派到中国去工作，卡玛1949年就出生在北京。后来美国刮起麦卡锡“非美活动调查”的黑风，韩丁1953年回美国后护照被没收，不能离境了；中美当时成了交战国，中国国内也越来越“左”。卡玛跟着母亲，在北京长大，经历了“文革”高潮，一直到中美关系解冻父亲应

邀重访中国。

我们的话头就从“文革”的经历扯起。

◇ “内外有别”：对我就得有别

多维：卡玛，请你先介绍一下你本人在“文革”中的经历吧，“文革”开始时你应该是上高一。

卡玛：对，“文革”开始时，我在北京101中上高中一年级。我是北京的外国孩子中唯一一个考上自己选择的中学的——我在这些孩子中年龄最大，我考初中的时候，还没有规定外国人准许怎么样，不许怎么样，所以我与中国孩子一样，报了三个志愿，参加统考，就这么考进去的。

北京101中不像外面传的是“干部子弟学校”，只不过1953年以前它是干部子弟学校，有些干部子弟就因为这个传统，愿意上这个学校。实际上像我那个班，清华北大的教授、右派的孩子，普通工人家庭出身的都有，干部子弟并不占多数。现在对“文革”想当然的东西太多了，涉及任何一个题目，都有不实传言。

不断激进的倾向，从“文革”前的几年，六三年、六四年就开始了。我进初中时一二三班学英语，四五六班学俄语，我本来被分到二班，但这个班班主任是数学老师，一看来个美国人，他不知道怎么管理，就把我推到了五班——五班班主任老师是政治老师。就是这样偶然的政治原因，让我学了俄语。当时我一不在，班主任政治老师就找我周围的同学谈话，“跟她说话要注意”“不要拿她的东西”。我在学校经常被挑出来：“这个政治报告你不可以听”，因为你是外国人，有时就在全校众目睽睽之下得离开。也有人一天到晚找我的碴。初二写作文“我的志愿”，我是喜欢在外边野跑的人，写我想当个勘探队员，就有个同学质问我：你为什么想当勘探队员？你是不是想把我们中国的宝都探走？！（笑）这种荒唐事“文革”前越来越多，给学生做关于农村四清成果、阶级斗争尖锐的报告，要求“对内要做到家喻户晓，对外要做到内外有别，绝对不允许外国人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我是我们学校唯一的外国人，就得对我“有别”。不过我有些好朋友，听了报告转眼就告诉我，所以我也没有怎么感到孤独。有些同学对我非常好，友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即使后来“文革”气氛越来越恶化，他们不顾对自己政治生命的影响，继续和我作朋友，没有疏远我，我一辈子都感谢这些人。

继我上中学之后，别的外国孩子都被统一分配到北大附中，“文革”一来就让他们回家了。“文革”工作组到我们学校时，本来是要我回家的，后来朋友们给我出主意，我写了封信要求留下受教育，工作组就让我留下了。

工作组搞了一段运动，组织学生去军训，我不能去，和一个同学留在学校看桃园。这个孩子的爸爸“文革”前就是关押着的所谓“反革命”，也不许参加军训。那事我都记不得了，她后来对我回忆说：你当时说，凭什么他们都走了就咱俩看桃园，走，咱们玩儿去！就去颐和园，游泳横跨昆明湖，一直游到龙王庙，游泳衣里掖着几毛钱，上了岛上还买爆米花。往回游时忽然又打雷又下雨……你可真会玩！

66年7月底突然工作组就撤了，学生回来了，我也回到学校。我们班几个革命干部、革命军人出身的成立了红卫兵，自认为是领导一切的，把我们同学划分左中右，谁谁是依靠对象、团结对象、打击对象，划到我这儿，不知划什么好，就写个大零蛋。“文革”中我没有被人打过——有些人有过极端的经历，但我没有。顶多有些老红卫兵对我破口大骂：你别想在学校呆着，滚回家去！

现在有些人一说起来，好象所有干部子弟都非常蛮横，实际上并不是这样。我们班就有干部子弟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在66年7、8月份联合写大字报批评“自来红”和“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能够接受我的同学有各种不同出身，对当时极端的“血统论”非常不满，我们就成了一个小圈子。

多维：你在“文革”中参加过什么学生组织吗？

卡玛：那时参加组织没什么手续，我当时要好的这帮人到了67年春天都是我们学校“毛泽东主义公社”这个圈子的，我也就算是吧，属于“四三派”。那时候组织也非常松散，一派内部山头也多，除了有些核心骨干，我们这些人比较逍遥，只是大的观点上近似。有个“公社领导”很做作，一副“领袖”作派，我们也很看不起。有一次他和对立派的人辩论起来，我们在一边看热闹。吵到激烈处，对立派的那个人鼻子一哼，说，“也不看看自己什么德行！满脑子领袖欲，还做伟人状，走起路来这样——”他停顿一下，抬起两个胳膊肘，将两个拇指插在胸前假想的坎肩袖口处，踱来踱去，目视远方，接下去说，“但并没有使人想起列宁！”我们都哄笑，大家都熟悉《列宁在十月》中的形象。那时确实有不少年轻人臆想着自己要成为什么伟人，可以说遍地是“小列宁”、“小毛泽东”。

◇ 戴上帽子装新疆人参加大串联

多维：你参加过“大串联”吗？

卡玛：当时按规定可不行，外国人哪能随便走啊，当时只有几个“开放城市”，象北京、上海，但还有个四十公里的圈，立了些岗，写着“外国人未经允许不准超越”。要想出去，得到公安局去申请旅行证。所以我后来不能去插队。一帮同学步行到内蒙去插队了，如果能允许我去，当时我就去了。

但串联的时候同学给我出主意，也都帮我撒谎，说我是新疆人，给我戴了个帽子，把头发都罩起来，从后面看着不显眼，从前面看要是看出我跟大家长相不一样，就说是新疆人，蒙混过关。人家有时候说那你说句新疆话，我就说我很小就到北京了，不会说新疆话。

有个初中同学，父母调动工作高中考到长春了，66年8月底回来说，长春那儿冷冷清清，你们还不来我们那儿点火？我们就在火车上站了十九个小时去了长春。不过我们中间有几个有思想的，尤其是有个高三学生，到长春那个学校看了两天后说，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指挥别人怎么革命？我们对原来的旧教育制度不满，那么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改进，建议？什么都没有，跑这儿来瞎闹什么？我们就回去了。

这时候学校也走空了，我们就全给进京串联的外地学生服务，后来有同学说，邢台地震区房子还没盖起来，咱们到那儿干点活去——那时我们受的教育，就是要接触社会，深入群众，就这么去志愿帮着盖房子，打井。在邢台我学会了一种中国最原始的打井方式。在那儿，1966年9月，我看到了“红海洋”——很穷的地方，村里土墙全刷上红油漆，用黄油漆写毛主席语录。我们非常反感，觉得这样是劳民伤财，背叛了毛泽东思想。

过了一个多月，报上又登了社论《红卫兵不怕远征难》，号召步行串联。我们当时认为那些坐免费火车出去游山玩水的都是“挥霍劳动人民血汗”，步行串联倒可以做——在这个层面上，我们是非常正统的。

多维：你们步行串联去什么地方？

卡玛：我们本来跟别人一样，想从北京走到延安，走过了河北特别穷的一些地方，我们住在老乡家，一盆盆水冻成一大砣子冰。翻过山头到了山西，就说去大寨看看吧，后来又到了阳泉。这个时候又出来一篇社论——原来学生不可以到工矿企业串联，当时有些老工人也说学生反党，甚至来打学生。但是六六年深秋，我们走到半途时，中央文革又根据什么需要，说要“迎接工矿企业文化大革命新高潮”，学生可以去工矿企业了。我们就去煤矿，呆了好长时间，每天下矿井——现在想起来就后怕，真危险！——有些坑道像滑梯似的，有些坑道里只能一条腿跪着，拿镐刨煤……

多维：你们不是去串联点火发动革命，是干活？

卡玛：每天都挖煤！当然我们也关注革命，是抱着一种向工人阶级学习了解的态度，想知道社会实际是怎么回事，并不是说我们比别人知道得多。那儿有很多“合同工”“临时工”起来造反，很多出身不太好的职工找我们这些北京学生诉说他们怎么受到歧视。矿上也成立一些组织，我们也不想弄清他们谁对谁不对——哪里弄得清！67年元月份到处夺权，矿工也跑到阳泉市里夺权，我们也去看，到各个办公室里看他们怎么抢大印。

后悔当时没有记日记，有些事现在印象就模糊了。人的记忆总是不可能非常清楚的，现在许多人写“文革”回忆录，太不严谨，怎么记得的就怎么写，很多人和事都弄得满拧，想当然的东西到处都是，越弄越糊涂，连学者都胡乱写！你倒是查查当时报纸啊，又不是查不到，总得把人啊事啊时间啊弄得准确点儿。

◇ 整天怪话的“洋学徒工”

多维：你没有跟同学一块儿上山下乡到边疆，当时给你安排什么工作了吗？

卡玛：我在家呆了一段，不愿意脱离社会，我虽然算是外国人，但是我出生在中国，我的母语是中文，不愿意被排除在外，就要求到工厂劳动。68年底我到了人民机器厂，正是遇罗克呆过的地方，我去的时候他已经被抓走了，但是有一些认识他的工人，这就又成了一个小圈子。

我和我的同学们在学校的时候，已经对当时的正统思想什么都不信了，用那时的话叫做“痞了”，看谁都不顺眼，对谁都讲怪话，当时年轻，觉得自己特深刻。那个年月认为谁“有思想”，谁就特棒。所谓“有思想”，就是不同意当时的正统。我们都是自认为有思想的人，传看了好多像《新阶级》，《日瓦戈医生》之类的书，还有一本美国人写的《我们对共产主义应当有所了解》，忘了作者是谁，我们对当时“文革”中很多事情已经有了不同看法。在学校里大家胡说八道，到了工厂我也照样胡说八道。当时上班要“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我有意乱抡胳膊甩腿，别人问我为什么不好好跳，我就故意说“我落后呀！”自己很得意。倒长班时，下班要用报纸将机器盖起来防尘，简直烦透了：翻半天找不着一张没有毛主席像、毛主席语录的报纸！下了班还得念报纸学文件，工厂条件不好，没有坐的地方，地上油油的，得垫上报纸，谁要坐上一张有毛主席像的，那就有麻烦。我当时就发牢骚，说这叫人怎么活？

有些年轻工人，是文革前因为出身问题没考上高中或大学的，对我说：社会可跟学校不一样，不能这么乱说，已经有人把你汇报上去了，说你“思想反动”。把我吓坏了。车间里有些机器比较大，上好一个机件，得走好几个钟头，我就去别的机床那儿跟这些人聊天。这些人也被警告了。我们不敢在工厂聊，就下夜班一起到龙潭湖，游到湖中心踩着水聊天。有一次忽然哗哗来了一队解放军，我们以为被发现了。赶紧游到边上藏在芦苇丛里，气都不敢出。

在这个厂呆了没多久。我有个表弟，是寒春和阳早的儿子，初中毕业时他妈妈非常坚决，闹着跟中国同学一起分配，不管去哪儿。他那时该分配时有了北京工厂的名额，表弟就跟着一批人分到光华木材厂当学徒，一个月挣十六块一毛八。他这样就算成了中国社会一个正式成员，不是“外面”的人，而我一直还被排斥在“外面”呢，我特别想作一个“里面”的人。于是我也到外专局去说，没想到也就被分配到光华木材厂，进了做塑料贴面的车间，一个月也挣十六块一毛八。这时候我已学乖，不敢乱说了。我表弟在那儿也干了一段了，我刚一去工人就告诉我：你表弟可好了，跳“忠字舞”特认真！

有一次对一批所谓“小偷”“流氓”“反革命”处理的“群众专政”讨论，居然也让我参加了。上级发下来一个名单，里面有政治思想犯，也有拿刀捅人、溜门撬锁的，让车间工人讨论该怎么判——没有法庭，没有法，没有程序，名单上每个名字下面三言两语写上点“罪状”，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形式！讨论中当然每个人都要显示自己革命，显示自己最恨这些“反革命”“坏分子”，都嚷嚷着不是“无期”就是“死刑”。我坐在那儿，真是难受！我们有什么资格、有什么根据判这些人呢？我就基本上不表态，只是有时说一句：“这够吗？”

多维：为什么你会老是质疑“够吗”？是因为你当时看过《新阶级》，接触了异端思想？

卡玛：对于当时这一套，我们早都非常反感了。记得遇罗克的名字就在上面，说他“恶毒攻击毛主席”，“写了大量反动日记”，大家异口同声：要枪毙！我说，这算得上“死罪”吗？大家马上就瞪着我：这美国人怎么啦？

多维：你以前没有资格参加这种会，这会儿能参加了，难道你没有终于能成为“里面”人的庆幸？

卡玛：没有。当时心情比较游离，只是觉得发生什么事我应该知道，可并不认同。不过，我当时不认同的只是这些具体的事情，还没有发展到对“革命思想”本身的质疑，我当时认为这些是对“革命思想”的歪曲。更早些时，1966年8月开始“万寿无疆”连喊三次，我们这圈人虽然自认为非常信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我们认为“万寿无疆”，“最红，最红，最红”之类是将毛泽东思想庸俗化的典型，极其可恨：它阻碍革命，将革命引向非常荒唐的极端，真的革命就没有了！我们并没对所谓“革命思想”，对意识形态作总体思考，只是认为革命不应该这样。后来看《新阶级》，抄了一大堆笔记。给我印象最深的几句话，因为经常给别人复述，到现在还记得。作者（德热拉斯——记者注）说：与以前的革命相反，共产主义是以取消阶级作为口号，但最后却造就成一个掌握空前绝对权力的新阶级，其他不过是欺骗和错觉而已。他还把这个新阶级与以往的统治阶级比，说，这个新阶级的贪婪就像资产阶级一样，不过它却没有资产阶级朴素节俭的美德；它的排除异己就像贵族阶级一样，但却没有贵族阶级的教养和骑士风度。我觉得写得妙了，但还是在想，怎么才能有真正的革命呢？

我的同学有时从插队的地方回来，有的人家里被抄得没地儿住了，就住我家。我们那时经常一起讨论书啊、胡聊啊、出去照相啊。我住的楼里有个堆扫帚簸箕的小黑屋，不属于谁家，我们就在那儿洗相片。有同学的父母就问：卡玛为什么要跟你们洗相片，是不是要拉拢你们，腐蚀你们？洗相片有什么特务活动没有？还有很多人劝孩子不要跟我来往，说沾海外关系没有好下场。同学中消息比较灵通的也来报信儿：公安局说我是“特嫌”（特务嫌疑），备了案。真是可笑，“特嫌”，我哪儿知道什么机密呀？

但1971年初忽然外交部打来电话，说中美关系要有一个变化，我父亲要被邀请来访华，突然一下一些政府官员对我妈妈和我就特别友好了。我父亲来后，我就陪他到处参观，开始拼命学英文。

◇ “文革”难拍，难在留下影像资料少

多维：你们拍了《天安门》之后来拍《八九点钟的太阳》，这两者是否有因果关系？

卡玛：时间上是这样，倒没有因果关系。“文革”这段一直是我们的历史，不断地在探讨、思考，任何人写出文章，我们都会找来看，一直没有离开对这段历史的关注。

多维：什么时候有拍片子的冲动？

卡玛：这种说法不适合我们这个片子。我这个人，这么说吧，不是那种能有大出息、特别想着要做大事的人，良心上的负担又特别重，总觉得，这么重要的历史，这么复杂的事件，这么多人流了血，这么多人人生经历……万一把握不好，万一弄出些什么错误来，就对不起人，要非常小心；我要是作了对不起人的事，又非常难解脱，会永远感到良心上的自责，所以我作事不是那么利索，不敢作很复杂的事。说得好一点，就是良心自责；说得不好一点，就是我怕负责任。（笑）这两个片子都是这样的，我好多朋友，包括中国的和美国的朋友都劝我拍，死说活说，把我说动了。

良心自责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文革”这个题材，写东西好写，作为电影来讲太难拍了，因为画面资料太少，不像《天安门》，1989年因为戈尔巴乔夫访华，全世界的媒体都拥到北京，五十来天，每一天都有很详细的影像资料，不仅是媒体，还有私人的；“文革”就不同了，记录影片是怎么回事啊？就是要用当时留下来的画面资料，再现当时的历史环境、事件，加上对当今人物的采访。而能找到的“文革”时的资料片太少了，局限性太大，我觉得就更难做。

朋友们对我说，只要是想拍“文革”电影，不是只作口述史，所有人都会遇到同样的困难，你拍不好，别人也拍不好，干吗不试试？还鼓励说：也许你更有能力拍好！再不拍，许多当事人都会不在了。

多维：“文革”全过程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事件，为什么您最后将焦点定在反映红卫兵？

卡玛：我们并没有把某一些人定为焦点。但不同经历、不同圈子的观众，从影片中能看出不同的东西来。出于过去的派别分野、或者意识形态阵营的分野，一些观众看到他不顺眼的人，就成了他心目中的焦点，有评论者就说，这部片子是“以北京几所重点中学的干部子弟为中心”，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过以他们为中心！我碰到加拿大一位观众，大概是属于左派，他就问“你的片子怎么以自由亲美派为中心”（指徐友渔、朱学勤等人）？（笑）大概他们看到不顺眼的人，就觉得特别扎眼，觉得这些人在影片中地位比别人重要。

我们在选择、取舍人物和内容时，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有没有画面。没有画面的支撑，说得再多也是“白说”。有些东西很适合用文字表述，或做口述史，拍一堆脑袋在一起说话，讲得再惊心动魄，不能成其为电影啊。作为影片，必须要有当时的影视资料作为表现的主要材料，能和这搭上的，自然在影片中就显得重要，没有画面支撑的东西，并不是本身不重要，而是无论编导如何使劲地去表现，与有画面的片段比起来，实际上也显得很苍白。

好在表现“文革”、争论“文革”、反思“文革”，我们这个片子不是唯一，我特别庆幸这一点：不是唯一。一部片子能利用这样一些资料，去表现一些用文字很难达到的效果，为“文革”的讨论、争论增加一个侧面，而已！我们并没有想去表现“文革”的全部，我甚至一直非常不愿意说这部片子是表现“文革”的，这样说容易给人以不切实际的期望——多少年的大事小事，

中央地方，那么多派别，你这部片子，能弄得清楚？不可能嘛。

◇ 什么最后重心放在当年中学生？

“文革”实际上不是一个故事，而是很多不同的故事。不同年龄段的人，经历和思想历程大不一样了。“文革”中在大学的人，他们在“文革”中的起点、高潮、终点，与中学生不一样。再比如说，如果反映内蒙，那么抓“内人党”可能是他们最激烈最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是几年之后，而不是六六年“红八月”。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故事很不一样，既然不可能把所有故事说清楚，两个小时长度不允许超过，还有经费的限制……那么，就只好圈定一个年龄段的人，把他们的故事说清楚，也能代表时代的一个方面。

我们的选择，集中在“文革”爆发最激烈的一段时间内处于中学年龄段的一些人的经历，以这种回顾为主。为什么这么选择？很大程度上是从影视资料考虑的。我们搜寻过，现有的影视资料中，除了大的群众场面，以及很少的像“破四旧”之类的资料，就没有什么了。有比较丰富的影视资料的，倒是“文革”前到“文革”中畸形的“革命文化”，这些内容又恰恰是我看到的描述“文革”的作品中比较少去表现的。

就是这样：一方面是我们受影视画面资料的限制，只能迁就有影视画面资料的内容；另一方面，现有影视画面资料能够支撑的内容，恰恰又是人们过去涉及较少的方面：关于“文革”的铺垫——1966年年轻人处于什么样的思想状况，不是一天就爆发成那样的，他们有很多年的铺垫，这个过程是怎么回事，在这些方面，影视资料比较充分。

多维：选定哪个年龄段，是依据你对哪个年龄段的人最为熟悉和感兴趣？譬如，你的同龄人？

卡玛：很难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我的同龄人，不过，这批人里我认识的比较多。大学生，像蒯大富等人，当然也可以考虑作一个片子将他们那些人的故事说清楚。但是，我们是首先找影视资料，所有能拿到手的都拿到手，再看它们能说清什么故事，就发现关于大学里的那些故事，很难说清；而且要说清他们为什么叫“红卫兵”，又得从中学说起，就太长了。

我们并没有先入为主地认定，我们偏爱中学这帮人，要搞这帮人的历史。其实，如果就我们的主观愿望来讲，还特别愿意避开主流，多挖掘一点原来人们没有注意到的。“文革”中北京中学生是比较为大家熟知的嘛，但是，像工人农民的处境，很少被关注，能拍出来不是挺好吗？我们挖空心思，想找资料来表现工人的故事。但我们发现，用纪录片根本没办法讲他们的故事。电影作为一种载体，必须利用它的长处，不能强求它的短处。没有影视资料的选题，偏要去表现，就不会有效果。例如，66年“红八月”由于暴力不断升级、蔓延，在北京一些郊区出现了对原来的地主富农“满门抄斩”的非常残酷的现象，我们也想表现，通过一些关系找到一个村，花了很多工夫想去采访。我们去了人找他们谈，作了笔记，最终还是没有弄出能编入影片的东西来——没有当年照片，带摄像机去又太扎眼，他们不敢说。

我们是将所有可能的线索都拿出来考虑了一遍。经过多次比较，最后才将范围确定在这批中学生身上：讲他们的故事可能是能讲得好的。中学生在形成思想的年龄段，他们对如何形成思想的回忆，能找到资料片，就比较好讲他们的故事。

我们为探索各种可能性花了很多工夫，有些路走不通，有些走通了，这里面有偶然性。我感觉，编历史记录片的人、研究历史的人，并不是说我可以任意选择，并不是说历史在那儿摆着，我们可以随便摘取任何一个“果子”放进我们的“果盘”。编片子的过程本身就有编片子的历史。历史有它的必然和偶然，有各种力量在互相作用。我们实际上是在和过去那段历史作一

种“对话”，有时候这种“对话”能达到比较深入的程度，有时候这种“对话”就中断了。观众看到的是一种结果，是“对话”中能深入下去的部分，实际上我们是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过程，我们放弃了很多深入不下去的部分。

我们最开始编出四五个钟头的东西，反覆斟酌筛选，哪一个片段更能表现当时的历史，思想经历，取舍哪句话，解说词怎么写、场景的转换和衔接……有时候就为了几句话——你想，很复杂的事件，只能用几句话去叙述就难免有偏差，怎样说偏差最小？我们三人有时候好几天想不出来。

多维：当时中学的老红卫兵有不少，为什么您一定要专门花时间说服骆小海，宋彬彬？

卡玛：不是我专门花时间说服他们俩，而是我花了很多工夫去说服很多人，只是他们俩被说服了！

要想让人同意上镜头谈，一个是看他愿意不愿意说自己的事，还有一个是看他能不能够信任我们能够公正地处理他的故事、他对我们谈的话。有些人过去被媒体采访，原话被歪曲，就再也不愿意谈了。

“文革”中打过人的人，唯一一个能够出来谈的就是杨瑞，她也写过书，叫做《吃蜘蛛的人》(Spider Eaters)。她非常诚实地、诚恳地谈到自己那时候参与打人。她说，当时一屋子人，别人都开始打了，自己打不打？在革命的面前是否经得起考验？是否英勇地冲上去？——“英勇”用在这儿来了！她怕被人看成是叛徒、逃兵。

她说，在当时的气氛压力下，要想作另外的选择，需要更大的勇气，需要良心的力量。她认为自己应为自己的错误选择负责任。但是其他干过坏事的人，我就找不着愿意出来谈的——所以现在就是宋彬彬为那些人背黑锅。

多维：解说词是谁执笔呢？

卡玛：解说词不是在拍摄之前写出来的，不可能像有些人想像的那样先写成一个脚本，再将镜头往上对。大的问题我们事先列出来了，采访很多人，搜集了很多资料，但这个故事的架构是什么？一点影儿都没有，是拍摄的、搜集的这些资料，不断在告诉我们：结构在哪儿，故事在哪儿。我们解说词是在剪接片子时不断斟酌，画面和文字不断互相调整。

论遣词用字的英文水平，白杰明比我们都要高，但是思想的商讨，哪一段怎么讲，是经过大家不断讨论，主要是我与白杰明，坐在那儿逐字逐句推敲；高富贵主要是在电影方面比我们强，但对中国的认识理解上不如我们两人。

多维：你们采访拍摄的素材花了多少时间？

卡玛：我记不清，几乎对每一个人都采访两天。我在约人上镜头采访之前，有一圈更广泛的采访，其中有些人我说服不了他上镜头，就没办法了。

◇ 当时的年轻人靠什么超凡入圣？

多维：影片大体线索和结构是怎样的，你为什么这么安排？



卡玛：片子的结构，主要是三个家庭。我们选择要考虑一个因素：他们的故事的跨度要比较大。像李锐和李南央这对父女，有一些很不平常的悲欢离合的经历——我们片子并不按照既定的“文革十年动乱”的格局，是以个人的故事，与大的历史背景发生联系的一种结构。李锐在延安整风时就挨整，到五九年庐山会议上又挨整，他的女儿不断努力跟他划清界线，直到最后李南央认识到她父亲的价值——整个跨度从四十年代到一九七九年，就能借这个故事说好多事，就比其他好多人的故事有更大的力度。

再有遇罗克、遇罗文兄弟俩的遭遇——遇罗克在“文革”中被杀害，不能出来说话了，遇罗文出来说他们家的故事。另一个就是王光美和刘亭。

虽然我总不愿意将人归类，我认为个人就是个人，每个个人都有自己新鲜的故事，即使与别人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是在我们的选择中，总得有某些大的代表性。譬如说，王光美和刘亭代表了共产党的最高层，遇罗克、遇罗文代表了政治地位最低的；还有中间的，他们都有不同的经历、遭遇。革命既吞掉了资本家的后代，也吞掉了老革命。

多维：但是这三个家庭中，并没有那种认为自己天然“革命动力”的先锋呀？

卡玛：那就是骆小海、宋彬彬等人了。我们片子中有三个家庭做为主线，但还有其他的个人故事。

多维：使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镜头和音乐，出于什么构想？

卡玛：《东方红》是当时革命文化的一部分，是毛泽东个人崇拜一步一步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六四年推出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六五年拍成电影，对青年人有非常深的影响，许多人到现在还记得那里面的朗诵词。《东方红》是改写历史，再造历史的作品，在我们片子中用它，一方面是以一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出现——告诉观众六四年发生过这么一件事；另一方面，它也起到一种象征作用，象征着历史被改写，被重塑，提醒人们领悟，在这么一种政治文化中，它起到什么样的影响；而我们在影片中，也是在设法再现历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应该警惕什么？昨天发生的事，今天再怎么讲，也讲不出昨天的事本身了，任何一段历史，再造重塑，都不是过去的那个时刻本身，回不到那个时刻，只能设法诠释那个时刻。那个时刻是立体的，我们的叙述层次再多，也不过是一些平行线。我们必须正视我们自己这个“文本”的局限性。

另外，《东方红》作为革命文化的代表，对于当时的年轻人来说相当于一种宗教仪式——在某些可以类比的程度上，就像在教堂里听着管风琴，唱着圣歌一样。人总要追寻人生的意义，在当时社会上，人们精神上没有其它东西，只有这个，年轻人是靠着这种东西来摆脱繁琐的世俗的日常生活，希望升华到一种超凡入圣的境界。在这种革命文化中，“上帝”，就是所谓“历史规律”，“历史规律”这种东西让你相信的时候，就是一种非常强大的力量，你觉得你是不能违背的，比某种个人的迷信对人的控制还要深。历史规律，历史舞台，再现历史……这些深层的内容，都是我们引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用意。

多维：你们想通过这部片子达到什么意图？

卡玛：我们通过这部片子如果能提出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能够引起更多的人对这段历史的关注，讨论，就达到目的了。我们的目标并不是很高，好像好像我们掌握什么别人不知道的真理，我们要去传播什么……我们没有这个。我们只希望有包容多种声音、包容多种经历的历史表述，将这个时代发生的一些事情和人们的思想历程再现出来。如果有人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收获，使他知道了一些原来不知道的事，想到了一些原来没有想到的观点，那就更好，那就算是“喜

出望外”了。

◇ 我欠中国观众一部片子

多维：这部影片什么时候首映的，共放映了多少场？

卡玛：去年二月在柏林电影节上首映；后来又去过香港电影节，旧金山、西雅图、丹佛、温哥华、多伦多电影节等。……在欧洲一些国家如法国、德国、芬兰等等国家电视上播放过。遗憾的是我们的 DVD 和录影带没有发行，原因也很复杂，主要是因为我们的资金是从美国国家人文基金会来的，要求我们的片子必须提供给 PBS（公共电视）放映，他们还没确定什么时候放映，我们就不方便作其它方面的推介。

这部片子在欧洲比在美国受欢迎。欧洲人一般来说比美国人的文化素质高一些，他们更关注世界，不像美国人这么狂妄自大，比较狭隘，觉得与他无关的事就不关心。表现其它地方的历史、社会的有深度的作品，在欧洲能赢得更广泛的观众。

多维：在公共场合放映过吗？

卡玛：在波士顿美术馆连续放过几个星期，在纽约一个专门放映非好莱坞主流影片的叫作 Film Forum 的小型电影院放映过两个星期，每天从下午 1 点到晚上 10 点，放映五场；一部严肃的记录片要能在那儿放映两个星期，就是了不起的事儿了。不过，我们发行的渠道还是比较少。公共电视台会放映，但是我觉得也不可能像欧洲电视台那样积极，“太难懂！”“太深！”——美国人一般喜欢看那些轻松浮浅的、有娱乐性的片子。

我们的发行是交给 NAATA（National Asian American Telecommunications Association，美国亚洲人影视协会）。我们现在最想做的是赶快作一个纯粹的中文版——解说词是中文的，采访原话都是中文的。现在的采访用英文同声翻译，将中文的原话就给盖住了。现在这个版本虽然制作了中文字幕，但是观众看字幕就分散了对画面的注意力，忽略了人的表情，而且字幕的字数有限制，也不是很能达意。我希望发行时，中国观众能看到中文版本。

翻译成中文不会完全与英文一样，总的意思不会变，但是文字的推敲，有大量工作，长短也不一样。翻译是比较难的，英文配画面作了非常仔细的推敲，哪个词落在哪个镜头上，按什么节奏切割画面，有很多讲究。中文的语法结构与英文不一样，英文单词落在哪个镜头上剪下去非常顺眼又顺耳，中文句子顺序反过来就显示不出来了，就得写另外的句子。中文每个概念、用语言表达的音节数，要比英文短得多，“revolution”，中文就是两个音节“革命”，完全照原样翻译过来节奏就有问题，所以就得重写。

多维：什么时候能完成中文版呢？

卡玛：我们正在筹经费，希望几个月内能完成。

多维：一年来观众是中国人多还是西方人多？

卡玛：还是中国人对这段历史更感兴趣吧。

多维：有没有设法进入中国大陆，在电视上播放，制作成 DVD 在市场上发行，等等？

卡玛：这由不得我啊，近期从中国的正式渠道向观众播放是不可能吧，是否有可能由于人们喜欢看，流传很广，而慢慢传进去，就随它去了。在我们比较满意的中文版本定稿制作出来之前，我们才愿意大量发行，现在也没有制成 DVD 和录影带。

◇ “文革”的荒唐事不仅中国有

多维：你们当时策划这部片子时，考虑过没有：是主要面对中国观众，唤起大家来反思“文革”呢，还是主要面对西方观众，对世界介绍中国“文革”真相？

卡玛：两者都有。“文革”具体发生在中国，但是所需要思考的问题也是世界性的。整个二十世纪的历史，是人类追求乌托邦的历史。“文革”是登峰造极，“文革”中突现的人性的恶，也不光是中国一国的事情，各个民族、种族，各种文化，都会有。有一些制度性的东西可能对人性中不可爱的一面能有一些抑制，恶性发展的机会不是很多。但是特定条件下，某一个国家，某一个种族、某一些人群，在他们感到受到威胁的时候、信仰受到挑战的时候，都会产生不宽容、对他人的敌对，同时压制自己阵营内部的异见。而以仇恨为动力的行为，却又往往打着冠冕堂皇的正义旗帜。

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就让我联想到“文革”中的荒唐事。例如，美国要打伊拉克，法国不同意，美国与法国本来是民主世界里的盟国，美国独立战争中还有法国人流的血，但是一旦发生这样的分歧，有些美国老百姓就表现出很不理性、很疯狂的反法情绪，法国酒泼到阴沟里去，甚至将“法式炸薯条”改成“自由炸薯条”，让我想起“文革”中非常让我嗤之以鼻的行为。当时有人把鸡蛋糕改成“斗私糕”，把江米条改成“批修条”，（笑）商店名字也都改了。这一套怎么又在美国再现了！同一类型的思路，只不过程度不同罢了。

如果只是老百姓起哄，解解气，那也罢了，但是美国国会里的餐厅挂牌，正式改了“法式炸薯条”的名。我真觉得丢美国的脸。有人开玩笑说，干脆“法式接吻”也改成“自由接吻”得了！（笑）甚至在竞选中说某人长得象法国人，居然也成了攻击、中伤对手的武器。这些都是相当丑恶的。这种不宽容、有不同看法马上产生敌对情绪的倾向，是普遍的，所有的人都应当警惕。

◇ “文革”远比犹太人被迫害更复杂

多维：关于这部片子，主流社会评论反响如何？

卡玛：目前影片放映还不是特别广，评论还不太多，参加了哪个电影节、在哪里上映，哪里的报纸就有些评论；我想在公共电视上播放前后，可能评论更多一些。有一篇评论写的有点深度，是 Charles Taylor 登在 Salon. com 上面的，对我们的结构处理和寓意，看得比较清楚。其它像《纽约时报》等，发的评介虽然篇幅很大，但是对中国的情况不是很了解，评论比较表面，叫好也不在点儿上。另外也有的过分偏于说“你看中国多可怕”之类——我哪里是想说中国“多可怕”！

多维：中文版解说词和剧本是否想到过出版？

卡玛：我想等到片子比较广泛地让人们看到之后，有人想研究剧本、文字再说。我怕有人懒得看片子，就看文字——这差得太远了。我们之所以拍电影，就是因为很多东西不能只用文字表现，抄近道看文字就没意思了。

多维：你谈到“理想主义”，有没有回过头来想想，你的理想主义的来源，是从年轻时在中国包括“文革”中受到影响，还是来美国后，看到美国人有理想主义这一面？哪个影响更大？

卡玛：这很难说。我的祖母并不是共产党人，但我的想法与她的想法很相似。你说这算从哪儿来的？再比如说，写《牛虻》的伏尼契是我的曾姨母，十九世纪末的一个英国女孩儿，自己活得好好的，偏要关注在沙皇统治下俄国的那些受压迫的人们，在伦敦的俄国、波兰流亡者圈子里交往，并成为“自由俄国协会”的骨干，听来很多故事，得到灵感，又将故事背景放在意大利写出小说……理想主义不是共产党专有的，共产党恰恰是对很美好的理想主义的一种异化，一种歪曲。一旦中国共产党说的那些有关理想的大话破产之后，有些人一说起来关注别人、利他的思想似乎都是共产党的东西，一律斥之为“左”，似乎都没有存在必要了——实际上并不是这样的。美国这个社会，就是因为有很多有理想的人、有利他行为方式的人，才呈现出很多人性、活力的方面。我很珍视自己的理想主义的人生观，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的理想主义与共产党有什么相通之处。有人说：“‘人’之所以比飞禽走兽显得更有希望一些，不全在他们脑瓜特别机灵，而在于他们中间居然产生了扶危济困的伦理思想，居然出现了与智力低的、相貌丑的、身体弱的、肢体残的兄弟姐妹同舟共济的道德行为。”我认为说得很好。

多维：在反思“文革”问题上，中国人一直争论很多。有人认为，中国人应该学习犹太人，他们通过各种方式牢记被纳粹统治下屠杀、灭绝的历史悲剧，中国人缺乏那样锲而不舍地追寻悲剧根源、防止悲剧重演的精神；但也有不少人认为应该放下仇恨，向前看，否则活得太沉重。

卡玛：“文革”复杂的程度，远远超过犹太人在纳粹统治下的经历。犹太人被纳粹屠杀，是一个民族要将另一个民族整个灭绝，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界限非常清楚，而“文革”就复杂得多——“文革”不是第一环了，而是怨怨相报好几个回合之后的又一环了；党内和社会的上上下下，从迫害者变成被迫害者，被迫害者变成迫害者……这种种情况，不是在纳粹德国轻易能找到的。这是更复杂的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简单套用某种模式，不能达到深刻反思的目的。

我认为对待历史、对待“文革”的态度，每个人都应从自己作起，我现在是通过编好这部片子的具体方式来对待历史。我也同意不要仇恨，复仇的思想是不好的，很多问题是制度上的问题；每个人解决自己良心上的问题，很难要求别人。不过，这段历史，我认为太应该关注，太应该讨论了，有些人不愿意谈，我是觉得非常遗憾的。另外也有一些人，动不动就说别人反思、忏悔不够，让我想起过去共产党“检讨过关”那一套，好象非得说出他们规定“上纲上线”的几句话才叫忏悔，有点“新正统”的架势。而要摆脱“文革”的阴影，我们是不是应该包容多种语言、多种方式、不同层面、不同程度的反思与忏悔？

~~~~~

【影视评论】

《八九点钟的太阳》与真实“文革”

• 双 叶 •

2月29日我去罗格斯大学看了卡玛的《八九点钟的太阳》(以下简称《太阳》)，人真多呀，比任何一次我在新州所参加过的文化活动的人都多，据说有六、七百人，能容纳约三百人的剧场里不仅仅是座无虚席，而且地下、过道里以至于门外面都挤得满满的。看来，从那个年代走出来的人无法忘记文革，对与文革有关的话题非常关注、敏感。事先已经有朋友打电话提醒我说，人可能非常多，建议我早点去。于是，每每有事总是习惯于最后一秒钟赶到的我破天荒第一次提前半小时到场，结果还是几乎找不到空位子了。

那谁谁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事件能被真正客观的描述，任何人描述的事件永远只能是他自己所理解的那个事件。哪怕那个人有足够的历史责任感，有足够的尊重事实所需要的素质、文化和技术，并努力有意识地克服自身的局限和狭隘。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努力逐步接近真实。卡玛这部《太阳》就是人们希望逐步接近真实的文革的一种努力。

从这个角度考虑，我就觉得这部片子总体来说已经很不错了。我个人认为，它至少让我们看到了一些老三届、当年红卫兵眼里的文革。卡玛是新共和国的同龄人，与其说这是一部反映文革的纪录片，不如说是一部份老三届红卫兵的心路历程简史，而且是相当有代表性的一部分人的心灵史，当然是粗线条的心灵简史，以及他们对这场大革命的反思。

影片是从建国初期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开始的，那是一个艺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成功的典型。文革中一大批重要角色：老三届、红卫兵们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文化背景中成长壮大。自从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用他独特的湖南嗓音传遍神州大地，给了新中国虔诚的子民们以美好的憧憬，整个社会显得异常兴奋、简单、激情甚至诗意，不假思索地向着伟大领袖描绘的海市蜃楼猛冲。当然，作为代价，残留的反动阶级：地、富、反、坏、右必须被无产阶级实行无情的专政。

《太阳》再现了许多历史镜头，包括毛泽东几次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几十万红卫兵的盛大场面，看着那些挥舞红宝书，高呼“毛主席万岁”，喜极而泣的红卫兵，我很难想像那是一双什么样的魔手，几万万的灵魂被操纵于股掌之间而不自知。对这一段当年善男信女们疯狂朝圣的历史镜头，影片配上了一段很妙的解说词，那是当今中国著名独立知识分子王力雄的一段话，他说：我们觉得现在的年轻人傻得很，那些个歌星、影星不就是会唱个歌跳个舞吗，既没什么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有什么好崇拜的？可是现在的年轻人看着我们那时候就觉得更奇怪了，一个糟老头子，穿了一身黄军装站在那里，即不会唱歌又不会跳舞，长得还不好看，有什么好崇拜的，有什么好激动的？这就是代沟。

伏尼契的小说《牛虻》显然在当年老三届的精神成长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是大革命年代里许多正值青春期的年轻人心仪的文学读物。根据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牛虻》的片断穿插在《太阳》里。编导颇具用心地对两个国度、两种文化、不同时代有着革命激情的年轻人相似的心路历程：从亚瑟到牛虻的历程，进行了平行对比，试图一层层地剖析牛虻（红卫兵）对红衣主教蒙泰里尼（伟大领袖毛主席）由爱到恨、爱恨交集的复杂心理。恐怕没什么事比虔诚、纯真、热情的精神被政治流氓玩弄诱奸更恶心的事了。事实上，离红太阳有一些距离的相当一批红卫兵多有这个心理情结，这样情况以中低层干部子弟、知识分子子弟居多，也有部分高干、工农、城市平民子弟。但北京联动以及与北京联动成员有类似家庭背景的高干子女不属于这种情况。他们过多了解内幕，有直接利益相关，他们与权力中心太近，失去了产生美感的距离，对他们来说，很多事从一开始就是赤裸裸的利益之争。

影片在取材、基调把握与烘托气氛方面都是比较成功的，其中不断穿插一些文革时期的风云人物如宋彬彬、骆小海等人的采访记录，以及思想知识界如王力雄、朱学勤对文革的深层思考。可以感觉到编导的良苦用心，尽力客观挖掘反思文革主要参与者的深层心理文化因素，而不是草草定个孰是孰非。

面对文革这样一只怪兽，满腹狐疑的人们最终都不可避免地想到同一个问题：毛泽东为什么要发动这样一场“大革命”？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文革是政治角斗场上的权力之争，另一种认为是毛泽东骨子里浪漫理想的政治追求在作祟，也就是朱学勤所说的毛的“文化理想”。因为毛泽东是人鬼神三栖动物，故以上两种可能性应该兼而有之，不能截然分开。但是毛泽东的

“文化理想”动机成分应该远远大于他的权力斗争动机。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刘少奇早在1968年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与之对峙的能力，而文革却在此之后继续持续了八年，迟迟没有中止。另外，如果毛泽东仅仅是为了从刘少奇那里夺回他的势力，以老毛那种玩得转、罩得住的政治手腕，周恩来、邓小平等一大批中共前要员个个都是人尖子，到了他那里个个都是服服帖帖、敬畏有加，不敢轻举妄动，要想灭刘好象犯不着如此大动干戈、铤而走险，冒着自己打下的天下大乱的风险。

显然，毛泽东即不是一般的人，也不是一般的鬼，他即不满足于一统天下，也没有满足于将异己势力收拾乾淨为止。他的确另有政治抱负、文化理想，即其神性。然而正是这种神性，比他的鬼性破坏力更大，给中国营造了一场空前绝后的灾难。

对普通老百姓来说，还是规规矩矩过日子要紧。老百姓的现实需要是如来佛的手心，毛泽东这金猴一个跟头十万八千里最后也还是没能翻出如来佛的手心。

~~~~~

## 【各抒己见】

红卫兵受骗？卡玛错了！  
——对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的初步思索

• 刘自立 •

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简称《太阳》）出来后，辗转从国外朋友处得到，且与有关人士讨论过对影片的看法。虽然意见不尽一致，但是讨论本身，还是得出一个很严肃的结论，就是：毛和共产党发动的文革，会由毛后的共产党人自己来全盘否定，将之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吗？

### ◇ 发动者的党不可能否定“文革”

我说的是实质上的否定，不带任何前提和条件的否定；站在否定专制文化和否定专制政治游戏立场上的否定，而非由此一党派中人，来否定此一党派中的另一些人，那种否定是肯定之变种。难道从逻辑上讲，不是这样吗？可悲的是，这种否定，根本就没有出现。（同理：对于纳粹帝国之反思，可以在希特勒在台面上的时候，得到全盘和深刻的反思和否定吗？）

何况，毛泽东今天的地位，至少比起邓在制订对毛三七开的时候，要更模糊不清——他被男女老少重新顶礼膜拜，绝非是愚不可及的神话；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知道，报纸、电视，天天都在鼓噪此事。毛的诞辰和所谓“站起来”的新中国，不但被共产党人自己纪念，还受到比如国际友人，远至戴高乐，近如希拉克等人的肯定。所以，在这个大框架里，毛发动的文革和整个政权的关系，是一个几乎难以厘清的话题，国内、国际皆如此。在此背景下，这部电影的问世，其实是起到了更加把水搅混的作用——这当然还是客气的说法。不客气的说法是，在表面上的批毛，否毛的词言中，偷换一个可以用非毛化的共党化，来代替和永远取消非党化思维对于文革的否定，以致造成一种为文革最后做结论的假象。

### ◇ 红卫兵运动面目模糊的根源

无论在电影内外，除文革的发动者没有被完全否定之外，文革的红卫兵运动，也处于一个模糊不清的朦胧地位。这个朦胧的语境，在几乎所有文革研究者那里，不是语焉不详，就是是非颠倒。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局面呢？奥秘甚多。简单说，红卫兵的出身，决定了他们的命运。

这个命运在文革初期小试锋芒，以后也一再经受考验——说明他们这些高干子弟的前途，哪怕就是在文革最激烈的时期，也是有保证的，是制度和血脉 / 血统的双重保证。

红卫兵，尤其是清华附中的红卫兵，是一种所谓“自发兴起”的民间组织，还是一种国家意志操控下的政治工具，这个问题，几十年没有讨论清楚。深而研之，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里，会产生所谓自发的，民间的组织吗？稍有常识的人，都会一笑置之。那么，没有任何自发性可言的组织，就是官方操控的组织了，这是逻辑推断和政治现实产生的结论。

于是，接下来的问题是：是谁，是那种势力，驱使和操纵了红卫兵；又是哪种势力反对之。具体讲，是谁，跑到清华附中来操控第一个红卫兵组织？他，代表谁，一手炮制了它的创建和诞生呢？

红卫兵中第一批兵痞们，就是高干子弟们组成的。其余的红卫兵，则是外围组织，像共产党领导的当年的外围。这个党文化色彩浓厚的组织原则，在1966年8月简化为一副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于是，老兵们像他们的老子一样没有理解毛的革命性质。因为，他们把六十年代兴起的阶级斗争和阶级出身理论，混同于毛的新革命实践了。所以，他们打乱了战略部署——是毛，而不是刘、邓、陈等人的战略部署。于是，在新形势下，反对党内领导的某种红卫兵思想，被大面积的封建遗传思想搞乱了。以至后来，中央文革的人要来否定血统论，因为毛不是在这个轨迹里滑行的。他当然要反对某种阶级出身的原则，才能做到万众响应——而万众确实也真诚地响应了他——这是权利的链条；但是万众响应，万众参予，也非他的长久之计，一旦目的达到，万众就可以也必须挥之即去了。红卫兵和联动们不懂这一点，刘少奇也不懂。于是，就出现两种文革，两种红卫兵。这是共产党人的一次分裂。

但是，在党文化之总体战略中，即便是毛刘之争，这个分裂，也是暂时的。现在，毛主席和刘少奇好像已经在各种党内外场合和平相处、相安无事了。但是，那时候，有几人看穿这一点？

#### ◇ 民间力量其实被毛操纵

一种所谓的，在“下面”发现的，政治上可资利用的资源，其实是上面一种观念先行的政治预设，是毛，或者其他领导人的一个想法；下面的拿上来，拿到报纸和电台上去广告天下，再由追随者拿下去，照办施行。这种游戏，今天看来很拙劣，但是，当时的中国人很少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以为是蕴藏在人民群众中无限可能性之一种。

聂元梓就是这个假民间资源的典型。其实，她不是什么民间意志的代表，不过是康生及其老婆曹轶欧手中一个政治玩偶。曹姓女人是聂对之负责的女人。就像清华的蒯大富，是周恩来在1966年亲自赴清华为他平反的。这时的周，已经站在反对工作组路线一边，以期赢得毛的信任。于是，蒯们利令智昏，以为自己发现了真理，发现了文革的路径，成为一种资源。他们一夜之间产生的信奉和狂乱，一直影响到他们的今天（不久前，蒯恬不知耻地说毛对他是“胜也萧何，败也萧何”）。他，是对党负责，对毛负责，且是对毛的特殊意志负责。那年冬天出现在北京街头“打倒刘少奇”的大字报，是老蒯们的民间力量之表现乎？否。是毛的意志。而毛，正是玩弄这种游戏的高手。红卫兵这件事，就是如法炮制的。一朝遭毛捧，人性全不在。这是民间力量在当时回报毛的一种表现。人们今天忽视的一个事实是，这些人从来没有自己的人格和思想，只是一些工具和打手。

#### ◇ 红卫兵暴行的催生者不仅是毛

红卫兵这个怪胎的出生，是那路神怪之意志，就比较容易区别了。

简单说，毛是需要红卫兵；而刘不需要。但是一旦红卫兵成为必须面对的一种存在，刘也要面对之、利用之。毛操控康生和曹轶欧，曹操控聂，贴出文革第一张大字报。这是文革研究者面对的第一个事实。那么，接下来的事实是，何以毛不满足第一张大字报，在1966年8月5号，自己赤膊上阵，写了那张“炮打司令部”的第二张大字报呢？

问题的症结是，毛和刘、邓的分歧已经出现，且表面化。刘邓派工作组的做法，扰乱了毛打倒刘的战略部署。我可不是要你搞群众整群众啊！毛说。此其一。我可不是要你只是打倒陆平、蒋南翔啊，甚至也不是光打倒彭罗陆杨。我是要打倒刘嘛。你们捣什么乱？

而刘，则在毛武汉游泳回来后，马上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工作组整群众的游戏，被改造为斗黑帮。这个黑帮，就是大中学校的校长，机关单位，部门，工厂的中层领导。这个转向，导致实际操控北京各大中学校红卫兵们，气势汹汹，大打出手。女红卫兵丧尽天良的程度，超过那些男生。

需要说明的是，这些不了解或了解毛战略部署不多的红卫兵，和那些从爹妈那里非常了解这个部署，进而争夺文革领导权的那些高干子弟、超级高干子弟大大不同。一种人认为，是毛在号召，我们紧跟就是；还有一种人知道，只有肆无忌惮地对中层干部大打出手，才能在毛那里有所交待，以保持毛的容忍，以保持对文革的掌控——就是在这个特殊阶段，他们制造了北京一些重点中学的惨案——如师大女附中打死校长卞仲耘一案。这里，简单将罪责——是罪责而非什么错误——归结为毛的一般性号召，不是全部事实。用当时的语言叙述之，就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营造一种白色恐怖。这个罪责，要归结为毛，但是，那时毛不在北京。是谁在呢？这是一个严重的事实。毛从武汉回来后，就写“炮打司令部”，是谁的司令部呢？这不言而喻。所以，在八月初发生的红卫兵殴打致死两名校长的惨绝人寰的纳粹暴行中，那些“炮打”的承受者有责任。这个发现没有被写进任何文字史料，迄今被完全忽略。

#### ◇ 高干子弟最终回到体制内

毛要打倒刘，不能用正统的党内斗争手段，不是他不想用，而是不可能；于是，他就用体制外手段。这个手段的承载者，就是中央文革。而中央文革一出来，就和红卫兵及其爹妈，形成一个你死我活的矛盾。这个矛盾是：你江青、陈伯达，怎么有刘邓的合法性呢？你们要打倒刘邓，就是要打倒我们的爹妈，他妈的，我反了！

于是，他们冲击公安部，高呼“刘万岁”，他们提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这个赤裸裸的接班口号，就是说，你等十三级以下的儿子女儿们，有啥权利革命，滚他妈蛋！（其他阶层子女就不必提及了。）我们，才是国家的主人，你们最多是建设者。于是，他们反江青们被抓了。但是，刑不上大夫，大水冲了龙王庙。大夫之子毕竟是老子的血脉。不教而诛，不行。周恩来说。于是，前辈晚辈一同鼻涕眼泪地和好如初，一抓一放，不过瞬息之间。一如毛说，你们是造反有理呢！他的话里有话。你们造不得中央文革的反；可以造社会的反，造成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大治，继而打倒刘，这是高干子弟很难接受的。任何人被利用，必须有被利用的可能性。高干子弟和广大红卫兵被利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可能的；但是，利用他们打击最为重要的政敌，就有些自相矛盾了。于是，中学红卫兵在社会层面胡作非为一通，遂即被毛置于边缘。他启用了清华、北大的大学红卫兵。现在，骨干力量，已经由什么宋彬彬，彭小蒙等，让位给大学的棍子——蒯大富，韩爱晶，王大宾，谭厚兰等。

九大一开，事情就基本做完一半。刘少奇既倒，整个回到体制内的操作变得可能。于是，



老子们和儿子们，很快就回来了。文革后期，他们没有像蒯、王、韩、谭们一样锒铛入狱，恰恰相反，他们从祖国广袤的穷乡僻壤，纷纷调进北京等大城市，仕途在望。而江青们还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倒是成为毛的替罪羊。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当年红卫兵们早就预言在前的前途。现在，卡玛出来说，他们是牛虻、是受骗者。她错了！他们一点也没有受骗。在释放联动的人民大会堂里，在上山下乡、当兵、工农兵上大学的岁月里，在他们应召复命，担当起各级重任之一刻……他们都很清醒。他们从一开始就预言，二十年后的天下是我们的。他们没有说错。所以，他们没有必要说，他们当年的所作所为是错误的。他们没有说，联动错了，对联错了，致死无数的人命错了。毛也好，周也好，江青也好，也没有让他们忏悔。血脉们及其爹妈制订的关于对错的准则，从来不涉及红卫兵问题。而回顾三十年前，当他们打死一个个校长，就像捏死一只只蚂蚁的时候，他们就知道，他们有权力这样做。即便是中央文革，也拿他们无奈。在欢快的杀人游戏中，他们呼喊的一句诗，就是——“相信未来”！

他们这样说，也这样做，且做到了。有什么做不到呢？国家的主人是他们嘛！

#### ◇ 卡玛的影片只“揭示一部分事实”

我们其实不好展开更多的细节。因为我们处在一个没有言说之可能性的环境。但是，如果人们不了解文革初期，毛检阅红卫兵之前的那段历史，就无法了解何以文革呈现的并非毛是坏人，刘是好人那般简单的格局。只有站在一个更高的准则上看，我们才能知道文革研究之困难。

回到《太阳》。不能不说，卡玛的影片，其实只是“揭示一部分事实”的影片。我们知道，揭露一部分事实，掩盖一部分事实，是一种谎言，是专制体制惯用的宣传伎俩。卡玛没有说明，党对于红卫兵特殊的礼遇，掩盖和遮蔽了他们的罪行。她更不可能说明，在八月初期，在各个中学大学之行为之控制，是另一只手操纵的结果——是一只无形的手和一只有形的手的双重控制——揭露这一点，是需要胆识的。甚而言之，卡玛是在有意识为那个行凶的特权阶层做一个辩护，说，她们是随爹妈受害而受害的，而不是那些大打出手者。她们在那里宣讲另一个事实——固然，那个事实不能不说也是很悲惨的；但是，一个事实，不能用来掩盖另一个。这是两个前提，两个条件。而其他在电影中出现的讲话者，顾左右而言他，以粉饰自己的责任。

电影里的讲话者，面带笑容地述说那个悲剧。说，你看，打倒“四人帮”一切就好起来……影片回避，或者说没有找到揭示文革红八月的大量图示和镜头，以至外人看来，这幕惨剧不过尔尔，没有纳粹迫害那么残忍无道。你看，长征，串连，上山下乡……不都是年轻人美滋滋、乐陶陶之行走乎？这让笔者想起关于揭示纳粹的两部片子。一为《意志的胜利》，一位为《意志的毁灭》。前者，是大名鼎鼎的L·李芬斯塔尔的著名记录片，后者是皮特·柯恩的影片，不太有名，但是颠覆了所谓“意志的胜利”——那不过是一个疯子和屠夫的意志。前者反映的是，纳粹之伟大意志之火炬，万众一心，一型（他们列出巨大的方阵），手持火炬，照耀着柏林，照耀着元首之场面……而后者反映的，却是犹太人的苦难，集中营和尸骨堆。

李芬斯塔尔，因为她制作了这部显然是为纳粹张目的影片，在二战胜利后，曾经数度入狱。但是，最后人们对她的评价是，她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她真的没有做任何和艺术无关的事情吗？

#### ◇ 《太阳》未来面临考验

再过几十年，卡玛的影片是否也会面临新的一部“意志的毁灭”的考验呢？当文革的惨绝人环的大量真实档案和真实场面——如酷刑、吃人、虐待、屠杀……公诸于世的时候，她和她的朋友们会想起李芬斯塔尔吗？是的，我们也同样经历了意志的胜利和毁灭——虽然，那种意

志根本从来也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志。在这个意志的驱使下，魔鬼和天使合而为一。你看到北京大兴县和城里长安剧院血流如注之场面，还是忘记了？你看到所谓的“牛鬼蛇神”在北京六中的刑讯室内，被开水淋身的惨象，还是忘记了？你看到多少老弱妇孺被强行驱赶出京城，还是忘记了？……是的，这部电影没有纪录和再现这些场面。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为之？

也许，这里，关于文革，还有许多我们没有涉及的内容，会在不久的将来，在将来的将来，被披露出来。但是，我们遗憾地看到，几乎没有什么人对《太阳》这部拙劣的影片有触及要害的评论和批判。只是王友琴、胡平，中肯地点到而止，但不够。所以，在适当的时机，我们将更为仔细、更为坦率地陈述己见，以引起更为深刻的，对于《太阳》，对于整个“文革”的反思。重覆而言，这个大反思将是站在文革发动者所在的党的局外人的地位来反思，其依据的，应该是国际认可和人类认可的天则和公理，而非某个人，某个党的什么决议；当然，党内外人士互补的反思和回顾也是很重要的，尤其是那些经历其中者。这个反思今天虽然尚在进行，但是，党内外人士以一种超乎中共语言、中共思想、中共标准，来评介文革的著作还是少之又少。那是一个偌大的漩涡，一不小心就会溺身其中，还自以为到达了彼岸。

~~~~~

### 【史实辨析】

看电影《八九点钟的太阳》有感

• 胡 平 •

◇ 为何造反派头头们都肯露脸也不改名？

象宋彬彬、骆小海这样一些老红卫兵的代表人物，或改名换姓（大名鼎鼎的谭力夫后来也改了名字），或隐姓埋名，不愿意今人认出自己，不愿意别人在见到自己时联想到过去那段历史。有趣的是，造反派的代表人物们都不这样。象首都三司的蒯（大富）司令，象后来到海外的上海工总司的潘（国平）司令，个个都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从不在意别人提起过去那段历史；也不在意别人认出自己，有的或许还生怕别人把自己混同于无名之辈，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的来历呢。这中间的原因值得探究。

粗粗分析起来，我们可以找到三条原因。

第一，虽然在官方宣传中，造反派的名声很坏，但在一般平民中，造反派的名声还是要比老红卫兵好得多。我们知道，造反派领袖们基本上是靠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起家，而这场批判多少带有反迫害的性质，在当时曾经获得很多民众的由衷支持。尽管造反派领袖们也干过不少错事，有的还犯有严重罪行，也伤害过许多一般平民；但大体来说，造反派领袖们主要是得罪了当权派，而老红卫兵得罪的却尽是普通民众。

第二，同样是为了夺权，造反派靠的是人多势众，造反派要广招兵马，走“群众路线”，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老红卫兵却是靠“自来红”，讲究的是出身纯正，纯而又纯，圈子越划越小，走的是自我孤立路线。

老鬼在自传体小说《血与铁》里写到这样一个插曲：一个姓周的同学，平时老穿着军装，理直气壮地参加红卫兵的会议，当场就有人起来质问他什么出身， he 说是革命军人，别人继续盘问你父亲是什么部队的？“六十九军的。”“什么时候入伍的？”“四八年，有起义证明。”“兵临城下，你爹敢不起义吗？国民党狗崽子，滚一边去！”接着男男女女齐声大吼：“滚蛋！滚蛋！”

滚蛋！”他被当场轰出会堂，狼狈不堪。

可以想见，老红卫兵一旦失势，马上就陷入四面楚歌，成了孤家寡人。不错，老红卫兵们很抱团，但是他们只和自己小圈子里的人抱团，和一般民众则很疏远。事实上，他们自己越抱团，就越是和平民疏远。造反派领袖们则不然，造反派领袖拥有大量的追随者，造反派领袖算得上群众领袖，一度拥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虽然后来形势变了，人心也变了，但当年那份“战斗友谊”却多少保留了下来。

换言之，造反派领袖们要比老红卫兵的头头们更有人缘。

第三，造反派领袖们大都被当局“秋后算帐”。从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到清查五一六运动，造反派头面人物很少有人幸免，轻的办学习班写检讨，重的挨批斗坐班房，一判就是几年十几年，武斗干将被判刑的也不少，甚至有枪毙的。很多造反派头头们在毛和“四人帮”主政时就挨整，毛死后“四人帮”垮台后继续挨整。邓小平主政后，中央还专门出文件，把造反派风云人物定义为“三种人”，永不重用。这就是说，造反派头头们都受过惩罚。如果说他们之中的许多人确实犯有罪过，那么，他们已经为自己的错误或罪行付出了沉重的、有的是过分沉重的代价。这就使得他们能够比较坦然地面对公众。即便有些人讲话写文章为自己翻案，也引起争议，但通常不会激起公愤——毕竟他们已经受过惩罚，何况其中还有的真有冤屈。

老红卫兵的情况恰恰相反。老红卫兵当年犯下的罪行令人发指，但由于当局的庇护，他们始终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不错，1967年1月，一批联动分子由于大反中央文革（是因为反中央文革，不是因为红八月的暴行）而被抓进公安局，但是只关了三个月。4月22日晚上，周恩来、康生、陈伯达、江青、杨成武、王力、关锋、戚本禹、谢富治、足有二十多人，亲自将被关押的联动分子接出监狱。江青开口就说：“委屈你们啦。”周恩来则说：“我们不能不教而诛，你们还是我们的孩子嘛。”这和他们对待平民子弟造反派的态度实有天壤之别。

后来，老三届集体下放，上山下乡，但唯有一些老红卫兵开后门入伍当兵；再后来，又有许多下去了的干部子女凭关系率先调离农村。从1972年起开始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干部子女自然近水楼台。在所谓工农兵大学生中，干部子女占了极不相称的高比例。在文革后清理“三种人”的问题上，中共高级领导人——包括以为人正派著称的陈云，包括最开明的胡耀邦——都强调当年的老红卫兵头面人物们不属于“三种人”，该提拔进第三梯队的就要提拔，“还是自家的孩子靠得住”嘛。

过去有句十分流行的比喻，叫“我把党来比母亲”。如今人们总算明白了，那纯粹是自作多情，党把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孩子分得一清二楚，岂容你鱼目混珠？

这就是为什么民众对老红卫兵至今仍不能谅解的原因。文革后，有些老红卫兵也登台亮相，控诉“四人帮”的迫害，但是对自己当年的暴行却闭口不提，顶多轻描淡写两句。许多人发出质问：你们为何不忏悔？你们已经躲过了惩罚，难道连歉也不道一声吗？

宋彬彬、骆小海可能是感到了这种无形的压力，所以不愿意让别人认出自己。他们在接受采访时都说自己当年没有打过人，而且还一直反对打人。一般人恐怕不容易一下子就接受这种辩白。问题是，由于当局的袒护，红卫兵的暴行从未得到哪怕是象征性的清算，行凶作恶者始终没有被摘拣出来，别人无从区分，这就让那些没有行凶作恶的老红卫兵们也沾上了说不清楚的嫌疑。这该怪谁呢？

◇ 宋彬彬的改名之谜

## 一、关于宋彬彬改名字

宋彬彬在影片《八九点钟的太阳》里接受采访时说，她在给毛泽东戴红卫兵袖章后，第二天的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说她改名宋要武，其实这篇文章并不是她自己写的，名字也不是她自己改的，而是报纸在未征得她同意就擅自以她的名义宣布改名字登在报上，是媒体强加给她的。

宋彬彬这段话很令人惊讶。不错，在当年，媒体塑造典型常常是笔下生花，想当然地“拔高”。那时的报纸常常登出老贫农张大爷说什么什么，老工人李师傅说什么什么，其实那些话并非真正出自张大爷或李师傅之口，而只是记者的编造，或者是记者“来料加工”的产物。但尽管如此，我还是对宋彬彬的解释存有疑惑：当年发表的那篇文章真的不是宋彬彬自己写的吗？如果真是记者捉刀代笔，发表前难道没有告知宋彬彬本人，征得她的同意吗？这样一件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无比光荣的大好事，何苦要背着瞒着当事人呢？可惜，影片的编导没有对此事进行查证。我希望有心人作一番调查。这种调查想来并不困难。只怕现在不查证，以后就无从查证了。

依我的推测，把毛随口说出的两个字就当作御赐新名这个“灵感”，或许不是出自宋彬彬本人，而是某位记者或报社领导人。问题是，宋彬彬本人对这个御赐的新名字会是什么态度呢？是反感还是受宠若惊？

我们知道，就在宋彬彬被伟大领袖改名宋要武的消息见报后，全国都兴起一股改名风。许多人，尤其是青少年，都给自己改了个更革命的名字（如“卫东”、“志红”）。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可见当时全校的同学（起码是绝大多数同学，首先是红五类红卫兵同学）都是为宋彬彬的改名而感到骄傲感到光荣的。很难想像偏偏是宋彬彬本人对自己被改名字会感到不愉快会感到不高兴。所谓“被媒体利用”一说，我以为只能是后来的感觉。到后来，革命小将，不论是老红卫兵还是造反红卫兵，很多人都感到自己被利用；然而在当初，尤其是在获得伟大领袖支持之初，他们可不是这么想的。

宋彬彬对改名一事究竟是什么态度？这个问题值得深究，因为它关系到对当年政治文化氛围的正确把握，关系到对当年一代人、尤其是干部子弟这一群体的思想感情的正确把握。这事要是落在我自己或我周围的同学身上，我们都会受宠若惊的。

“八一八”之后的一段日子，宋要武无疑是全国青少年中最响亮的一个名字。宋彬彬显然很清楚她的新名字具有何等意义，所以她在此后的革命行动中都用的是宋要武这三个字。例如她在南下武汉时就用宋要武的名字发表声明指点江山。

王绍光在《理性与疯狂—文化大革命中的群众》（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一书里写道：“王任重利用他的地位和权力，组织几批北京红卫兵，由清华附中第一个红卫兵组织的发起人卜大华和8月18日为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的宋要武带领，离京奔赴武汉。卜和宋当时都是全国出名的红卫兵，他们的使命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武汉的政要们把他们视为救兵并给与了特殊的礼遇。这些新来武汉的人以‘真正的’北京红卫兵的身份赞扬了武汉的领导层，因而他们在反击其他北京学生的同时帮助巩固了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的地位。”（页65）

武汉地区文革风云人物之一鲁礼安也讲到过，在当时，署名宋要武的铅印传单（内容是保卫湖北省委和武汉市委以及谴责“南下一小撮”即来自北京的煽风点火炮打省市的造反红卫兵）夹在《长江日报》和《武汉日报》（这两份报纸印数多达几十万份）中在武汉地区广为散发。

不错，宋彬彬后来又给自己改了名字，对外既不叫宋要武，也不叫宋彬彬。因为世人皆知宋要武即宋彬彬，宋彬彬即宋要武，所以她又改了一个名字，叫宋岩。不过从情理上推测，那应该是他们这批老红卫兵被他们的红司令毛泽东抛弃，其名声由“香”变“臭”之后的事情。

## 二、也谈《点滴思忆话宋岩》

我是在一本回忆文集中得知宋彬彬改名宋岩的。1991年，北京的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由当年赴内蒙草原插队落户或军垦拓荒的知识青年写的回忆文集《草原启示录》。由于是回忆文集，作者几乎都是真名实姓，篇末还详细注明当年所在公社名称或兵团番号。其中有一篇《点滴思忆话宋岩》（不久前有热心人把它贴上网）。这篇文章却很是与众不同：

第一、作者署名很奇怪，叫“朝鲁陶斯”，既不像汉族人名，也不像蒙族人名。按照文章的描述，作者应是北京的知识青年。文中有一处写到司机叫“我”问路，把“我”称为“你这个蒙古通”。如此说来，作者并非蒙族人。

第二、别的文章在篇末大都详细注明作者原来所在地名，什么盟什么旗什么公社或生产建设兵团几师几团，这篇文章后面只写了个大而化之的“作者原在锡林郭勒盟”。

第三、别的文章或者是作者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或者是回忆和自己有直接交往的别人（如同学或插友），这篇文章却是拐弯抹角地写一个作者没有任何直接交往的宋彬彬（文章承认，“其实我只在那幅全国闻名的新闻照片上见过宋彬彬”）。这篇文章写的是“我”在一次迷路问路时，偶然走进了一个蒙古包，和包主人闲聊，无意中知道了这里原来是宋彬彬当年插队落户的地方。正是从包主人那里，作者才得知宋彬彬“文革初期改名叫宋岩”。文章借这位包主人之口讲述了很多有关宋彬彬的优秀事迹，其中特地澄清了宋彬彬搞打砸抢的传言。文章转述了宋岩对别的知青讲的一句话：“有人把我说成是个青面獠牙的武斗狂，其实别说打人了，就连看到别人打马我都心颤。”

众所周知，回忆录的生命是真实。所以，写回忆文章要求作者尽可能地亮明自己的真实身份（姓名、地址、单位等），并且提供第一手材料。尤其是这篇“点滴思忆话宋岩”，讲的是一个名人，因此格外需要向读者展示一种权威性，然而这篇文章不但作者的身份暧昧不清，而且又是间接转述别人的话语，这就使其可信性大打折扣。越是细读越是觉得它不像回忆录，它更像是一篇特地为宋彬彬而写的辩护词。

当然，为宋彬彬辩护澄清也无可非议。宋彬彬既是名人，想来也深受名气之累。成为名人，就是成为符号，成为代表，成为箭靶子。凡是和这个符号有关的事情，不论好坏，不论真假，都可能挂在你的名下。一般人常常不求甚解，于是往往以讹传讹。当这个符号是正面意义的时候，你是“三千宠爱在一身”，沾了别人很多光；当这个符号是负面意义的时候，你就变成了“千夫所指”，免不了替他人背黑锅了。

## 三、是“一直反对打人”吗？

老红卫兵最突出的“功绩”之一就是打人。作为老红卫兵的领袖人物，宋彬彬打过人吗？已故千家驹先生在《自撰年谱》里写到，宋彬彬和别人比赛，那一个红卫兵打死了六个人，她为了胜过那个人，就打死了八个人。可见，关于宋彬彬打死人的说法流传很广。

宋彬彬在《八九点钟的太阳》影片中说：“破四旧呀，抄家呀，我一次都没参加过。但是到处都是我的谣言，就说给毛主席戴袖章的宋要武，怎么怎么样打人。我觉得特别地委屈，因为

我一直是反对打人，反对武斗的。当时很多学校的一些红卫兵，就到我们学校来看我，但是他们都特别失望，就说你怎么是这么一个样子，你跟我们的想像一点都不一样，就好像你一点都不革命的意思。我就觉得我这个名字和形象都完全被剥夺了，我自己一点控制的能力都没有，特别地生气。同时我也觉得为了这个名字，使得那么多的人受到迫害，觉得非常地难过。我们当初想的是批判文化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现在这个文化革命已经跟我当初参加的时候所想的距离太远。”

我以为，假如宋彬彬确实没有打过人，那么她做出这番解释是完全必要的。不过，要说她自己“一直反对打人反对武斗”，那就很值得商榷了。

自己是否动手打过人，这是一回事；自己是支持打人还是反对打人，这可能是另一回事。有的“黑五类狗崽子”还动手打过亲爹亲妈呢，你能由此断言他是支持打人的么？尽人皆知，当头头的多半是“动口不动手”。昔日共产党在农村搞土改，很多地主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基本上都不是工作组的人动手，但是，那能证明工作组反对打人吗？

王友琴博士在《卞仲耘：北京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一文里，对宋彬彬所在的北师大女附中在红八月期间打老师打同学情形作出了详细的描述。卞仲耘是师大女附中第一副校长，在1966年8月5日那天被打死，就在学校操场，被该校的红卫兵群围攻殴打，从下午两点一直打到五、六点，“其间没有一个人出来制止”。学校对面就是医院，五点多钟时，另一位被批斗被殴打的副校长胡志涛，见卞仲耘已经奄奄一息，提出送医院，但被红卫兵愤怒拒绝，等到晚上校工推车把卞仲耘送到医院时，卞仲耘早已断气，尸体已经僵硬。事实上，从六月下旬起，北京师大女附中红卫兵就开始了老师的折磨殴打，作为该校第一把手的卞仲耘首当其冲。在临死前一天，遍体伤痕的卞仲耘回到家里对丈夫说，红卫兵打死她那样一个人，“就像打死一条狗”。

从目前已知的材料看，没有材料证明宋彬彬参与了殴打，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宋彬彬对这场残忍血腥的殴打表示过反对。宋彬彬是党员，是该校第一张批判校领导大字报的排名第一的署名者，是该校红卫兵负责人，校文革副主任。在校领导被打倒，工作组又撤离的红八月，宋彬彬无疑是全校不数一也数二的最有权势的人物。卞仲耘被打死的那个下午，宋彬彬就在校园。如果她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就算不能避免打人事件的发生，难道连把人活活打死也避免不了吗？宋彬彬可以说她没有动手打人，但是她是否可以说她一直反对打人呢？假如她没有当场出面表示反对和制止的话，而她当时正处在最有资格也最有责任出面反对和制止的位置上。

同样的问题也应向骆小海提出。骆小海也说他是反对打人的。我们知道，清华附中红卫兵在8月27日发表过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在肯定破四旧的前提下“纠偏”。严厉批评了“打人”，“对前学校的党政干部一律以黑帮论处”，“谁家都抄”等作法。然而，正象王友琴在《清华附中模式》一文里写到的那样，清华附中红卫兵正是打人之风的始作俑者之一。从6月起，清华附中红卫兵就开始打人。8月26日，由清华附中红卫兵负责人卜大华等主持，在清华附中五楼大教室举行“斗争会”，晚上7点钟开始，一直进行到深夜12点钟左右才结束。在会上，许多校领导和老师遭到了残酷野蛮的殴打。红卫兵用铜头军用皮带以及用塑料跳绳拧成麻花状的一种鞭子猛抽。当时正是炎夏，人们都只穿单薄的衣服。皮带和鞭子抽下去，落在人的身体上，一抽一个血印。注意：这是红卫兵亲自主持的斗争会，或许卜大华、骆小海没有出手，但是作为大会的主持者，他们出面反对出面制止了吗？他们难道不应该为这场暴行负责任？

当年骆小海的同班同学仲维光在《“清华附中红卫兵小组”诞生史实》里写道：“拳打脚踢，游街示众，从六月中旬后越来越普遍。到了三论造反精神发表的七月下旬，清华附中鞭打学校

干部、老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到达了高潮”。“在这一切过了高潮之后，即在红八月的下旬，所谓十六条公布几近半个月后，清华附中红卫兵，人该打的打了，该专政的也专政了，于是演起了他们父辈——中共历来在运动中所使用的手法，写了一篇‘清华附中红卫兵对当前形势的十点估计’。这篇估计当然不会超脱党八股，它首先充分肯定了那时的大好形势，然后就是对大好形势后的问题，如不合政策的打、砸、抢等所谓过分为提出了批评。所谓它引起了首都市民的欢迎，是确实的。在那个肆无忌惮、草菅人命的时候，无论是谁出来说一句‘打得好！但别打了’，都会受到热烈的欢迎的，即使他就是打人的发起者。共产党每次的落实政策不也都是受到人们的欢迎吗！但是这又能说明什么呢？这难道不正是生活在极权社会下的人的悲剧吗？”

#### 四、对文革的反思和研究还有待深入

我们甚至可以假定宋彬彬、骆小海们本来从心底里是厌恶打人，反对打人的；那么，他们又为什么不当场出面反对出面制止呢？这大概就是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的结果了。因为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群众发动起来了，要鼓励，不能给群众泼冷水，不能站在群众前面指手划脚，如此等等。按照这种观点，那些“有问题”的人挨打，甚至被活活打死，就算不是活该，起码是无关紧要的，是无损于革命大方向的正确和红卫兵组织的光荣的。所以，宋彬彬、骆小海们才能拿着那幅沾满无辜者鲜血的红卫兵袖章毫无愧色，一点不发颤，继续骄傲地戴在自己左臂上，还把它当作最崇高的礼物献给心中的红太阳。这决不仅仅是老红卫兵的问题。许多造反派也是如此。

研究极权主义的著名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提出过一个概念，曰“恶的庸常性”(banality of evil)。她指出，很多纳粹罪犯并非天生的歹徒恶棍，如果生活在正常的社会里，他们都会是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人。几年前，美国学者丹尼尔·乔纳·哥德哈根写了一本书《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作者通过对大量的史实材料、幸存者的回忆和追述等资料的分析得出结论，当年纳粹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罪行是借助于千千万万的普通德国人之手进行的，而这些德国人是自觉自愿地参与了对犹太人的迫害和屠杀。大屠杀是德国反犹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那么，中国的文革呢？在文革中发生的一系列暴行，难道不是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当然不是全体）参与、而且是自觉自愿地参与的吗？这里，我们还有很多问题需要挖掘，需要深究。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